

# 安哥拉战火重燃

大 培

安哥拉 1975 年 11 月独立后不久，“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和“安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便打起内战，1991 年 5 月双方在里斯本签署了《和平协议》。按照协议，于 1992 年 9 月在联合国派驻机构的监督下，举行了自安哥拉独立以来第一次议会和总统大选。大选结果，执政党“人运”和现总统多斯桑托斯获胜，但总统得票率差一点没过半数（49.57%），安盟及其领导人萨文比失利。萨文比事后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双方旋即于去年 10 月底在首都罗安达发生军事冲突，不久战火蔓延至全国。目前，内战仍在激烈进行，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安哥拉再次成为非洲大陆的一个热点。

安哥拉形势的反复，令人深思。

**首先，这是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在非洲大陆长期争霸对安哥拉造成的恶果。**安独立后，美国和原苏联各支持一派打内战，使安哥拉成为冷战时期最大受害国之一。16 年的内战，给这个只有 1000 万人口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30 万人丧生，百万人流离失所，战祸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00 亿美元。苏联解体前，苏、美为了缓和彼此关系，对各自所支持的一方施加压力，极力撮合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应在大选前全部遣散各自的军队，建立一支 5 万人的统一国民军，但由于谁都不想先于对方交出军权，直至选举前夕，各方遣散的军队均不足半数，新组建的国民军仅万人。这实际上已经潜伏着内战重新爆发的危险。现交战双方所使用的军事装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过去两超提供的。

**其次，权力之争是内战再起的根本原因，它又与部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安哥拉两派的权力之争主要表现在争夺总统职位上。安盟在大选前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对选举失败结果难以接受，提出应举行第二次选举，并要求解散政府的 3 万准军事警察部队。“人运”强调选举结果有效，并于去年 12 月成立新政府，并分配 5 名正副部长职位给安盟。但安盟拒绝合作，立场异常坚决。安政府把安盟视为 20 多个在野党之一、与政府不能平起平坐，并声称除非安盟解除其武装力量，重建统一的国民军，否则不再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

近几个月来，联合国、美国、俄罗斯、葡萄牙以及非统组织多次进行调停。联合国安理会今年 1 月 29 日又通过要求安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决议，但迄无成效。从安哥拉内战形势和力量对比看，双方实力大体旗鼓相当。战场上互有攻守，各有得失。今年 3 月初，安盟经过 56 天的激战收复了第二大城市万博，而安政府 3 月中旬夺回了失守两个月的重要石油产地索约。安政府在军事装备上略占优势，控制着多数都市，又占据中央统治地位，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和宣传工具。安盟则占领着 2/3 以上的广大农村和少数城镇，拥兵数万，又

有占全国人口 40% 的最大种族集团奥文本杜人的支持,兵源不成问题。可以说双方都拥有继续打下去的资本。从国际社会当前对安哥拉两派的态度看,支持安政府者居多,安盟则相对处于不利地位。

安政府和安盟在战场上已兵戎相见 16 年,历史证明,使用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决出雌雄。当今之计,只有民族和解才是唯一的途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安双方应该遵守 1991 年的和平协议,接受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调解,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尽快回到谈判桌前,重新踏上和平进程的轨道。同时,外部势力不应介入安的军事冲突,以免使局势复杂化。

---

(上接第 40 页) 我们被要求去阻止中东、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军备竞赛,但我们却没能劝说以色列放弃军事技术优势。我们还必须保持向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出售军备的自由。在总统竞选期间,我们也保留了违背庄严的外交义务而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的权力。然而,当我们试图标榜自己为控制军火贸易的典范时,这样做肯定玷污了我们的形象。

总之,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外政策已失去了重点。一大批意义良好的目标并非是令人满意的替代品。美国应该筛选其政治目标以及为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而应采取的手段。

### 使行动符合长期利益

由于电视屏幕上闪现的画面的鼓动,我们已过于乐意采取行动,而不考虑代价。美国并不特别擅于扮演警察角色。人们要求美国到诸如波黑这样的地区采取行动,并不是因为它能单独完成任务或特别适合这个任务,而是因为其他国家觉得让美国承担主要义务比较合适。如果美国经常被要求去承担这样的义务(即使其他国家分担责任),美国公众会很快厌倦这种任务,——更重要的是,美国作用真正必不可少时,他们却不愿意卷入了。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处于更加无政府状态。世界上有许多动乱的地区,今后还会更多,数也数不清。不能要求美国、美国也不能治愈全世界的苦难。我们只代表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目前正在缩小),警察的厄运也并不是我们的天赋。

显然,冷战中美国迎接了挑战。40 多年来,美国保持着对易北河的警惕,保护了西欧国家免受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威胁。但是冷战只有一个,当时存在着明确的现实危险,足以赢得美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

然而现在,这一主要威胁已经消除,无数多变的动乱地区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我们的长久利益便不易明确确定,也难以识别。在这些急剧变化、极其动荡的条件下,美国能否“坚持既定方案”或“耐心等待其后果”呢?这个问题还无法回答。部分答案肯定是:如果公众负担过重,如果我们毫无明确目的地过多卷入海外事务,如果我们凭一时冲动卷入这些事务,我们就不能做到。

在外交政策的这一新范围内,我们能把住方向吗?我们只有严格筛选少数真正涉及美国社会长期利益的任务,并避免被许多次要任务——它们会使美国公众失去耐心——转移目标,才能够做到。

(周 镜摘译自《外交季刊》春季号,索 阙校)